

冷战起源背后的文化冲突

——兼评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性

朱 鹏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对冷战起源的探讨,可以从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引发的冲突展开分析。一方面,透过历史上俄罗斯文明在努力寻求西方化的发展过程中遭受的挫折和西方对俄罗斯文明的歧视与遏制心理,能够看到西方对俄罗斯文明的不友好甚至是敌对态度,而这种由文明差异性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冷战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基督东正教文化背景的“救世论”衍生出了俄罗斯民族的“大国使命感”,而基督教新教文化背景下的教徒“使命感”和美国的“世界楷模”观念则衍生出了美国的“大国使命感”。这两种“使命感”随着二战后各自实力的迅速飙升而急剧膨胀,并由此带来双方在外交理念和对外政策中的冲突升级。

[关键词] 冷战起源; 西方化; 差异性; 大国使命感

[中图分类号] D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9)03-0007-05

冷战是整个 20 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而冷战起源的背后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文化分歧和冲突。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正是揭示了在国际关系中地域间的冲突、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等等都应该放在历史中大的文化发展背景中考察。溯源文化发展的脉象,寻找冲突背后积淀已久的文化根源,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和分析一些国际问题出现的原因。本文试图从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存在的差异性出发来分析冷战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冲突。

一 俄罗斯文明发展的取向 以及与西方文明的关系

(一) 当前对俄罗斯文明特性及归属的研究状况
在世界文明的分类中,俄罗斯文明应该归属于哪一类,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亨廷顿则按“文明冲

突”的断裂带将世界文明分为 8 种,俄罗斯文明没有单独列类,但显然属于其中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传统的西方文明分类法是以技术文明(西方文明)和传统文明(东方文明)两大类来总括全球文明。而不少俄罗斯学者指责这种分法比较粗略,他们倾向于俄国文明一方面表现出诸如:公有性、集体主义、为民族服务的精神等传统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探索和发现的“西方精神”^{[1](P.47)}。这体现出了俄罗斯文明虽兼具东西方文明的成分,但自身却并不单独归属于东西方两种文明中的任何一支。进一步讲,俄罗斯文明把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一些特性融于一身,而俄国文化中呈现出的“二元性”甚至“多元性”特征又使其自身带有某些结构性的矛盾。历史上的俄国在社会、文化、生活等多个领域常常充满着彼此矛盾的各种价值取向,这也促使俄国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阶级、阶层、教派、宗教、亚文化

群体等。简言之,俄罗斯文明缺乏一种稳定文明所具有的强大文化整合功能和某种成型的文化构成原则,像中华文明中的儒家政治伦理、印度文明中的种姓分配原则以及西方文明中的分封等级原则等等。步入近代,为了实现工业发展和科学进步,俄国不得不通过不断改革来追求西方化,但也为此付出了民族文化离析的巨大代价。因而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俄国的西方化未能真正奏效,它的发展更多地是建立在“西方化”和“斯拉夫性”这两种文化潮流不断碰撞和融合的基础之上。

(二) 俄罗斯文明在历史发展中经历的西方化历程

历史上俄罗斯文明的发展取向于西方。在它的历史上,既在东方大规模扩张疆土,同时又在西方寻求融合文化上的融合,力图使自己跻身于一个“文明的西方国家”。可是它最终未能真正融入到西方文明中,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演变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历史走向和自身在未来国际关系中的发展。

俄罗斯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基辅罗斯、鞑靼人统治下的俄罗斯、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当代俄罗斯六个发展时期。其间,俄罗斯经历了五个社会—文化的转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影响、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具有俄罗斯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发展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2] (P. 98)}

在这几种俄罗斯历史上的文化形态中,除了鞑靼统治时期和苏联早期之外,其余时期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俄罗斯社会的“西方化”进程。可以说,“西方化”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

俄罗斯在基辅罗斯时期,经“罗斯受洗”后开始皈依基督东正教,从而间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欧的衰落与鞑靼人的征服阻隔了俄罗斯在13—15世纪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步伐。然而在此期间,文艺复兴的新鲜空气已经在自南向北地改变着西北欧国家的精神面貌。直到彼得大帝统治俄国时期,才通过强制性的西方化改革,使俄国人的目光重新转向西方。此后的俄罗斯在不断的西方化改革中渐渐强大起来,最终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在军事上取得了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也带回了西欧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想的火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使俄罗斯在努力建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过程中最终受到挫折,开始尝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种全新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探索中逐渐开创了一套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迥然相异的建设模式。

(三) “恐惧和歧视”——西方对俄罗斯文明态度的主旋律

1. 历史上,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回归西方文化的态度并未给予认同。从中世纪早期起,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心存芥蒂。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东欧的宗教是由拜占庭而不是由罗马传过去的。因此,欧洲西方与欧洲东方的文化发展方向就此殊途。除了宗教差异外,俄罗斯也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西方文明中特有的历史现象。“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3] (P. 147)}“俄罗斯有史以来一直是个特例,它从来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4] (P. 8)}“20世纪之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的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3] (P. 171)}在西方人看来,彼得大帝在俄国推行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体制,并消除了社会或政治多元化出现的潜在根源,从而使其在文化特征上凸显出更多的“亚洲特性”。而后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甚至列宁和斯大林,在采取不同方法使俄国走向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强化了这种专制和集权特征。

2. 这两种文明间的冲突不仅来自于相异文明间固有的差异,还归因于人为产生的“文明歧视”,具体表现为欧洲的“恐俄症”。俄国在近代欧洲政治舞台上曾一度崛起,并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而西方人对此则表现出了既蔑视又恐惧的复杂心理,并在行动上采取排斥,遏制乃至武力压制的

方式。

在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各与会国还认为俄罗斯不够参会资格。但经过彼得大帝西化改革以后,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俄罗斯成为维护欧洲均势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极,并最终“迫使欧洲把它当作政治舞台制衡因素来对待。”^{[5] (P.46)} 在 1815 年,当维也纳体系削弱了法国,迫使其回到欧洲均势的政治格局中时,俄国却在此时迅速崛起成为一支维护欧洲均势的新起之秀。这引起了当时欧洲大陆强国的极大不安,特别是英国。英国担心日益强大的俄国会对中东、印度和远东地区造成威胁,因而开始把外交政策的重心偏向于遏制俄国力量的增强。为此英国在政治和军事上联合其他西方强国,竭力限制俄罗斯势力的膨胀,重点是在“东方问题”上与俄罗斯展开激烈争夺。19 世纪 40 年代初,英法借埃及危机迫使俄签署《伦敦公约》使其放弃了通过 1833 年与土耳其签署的《温斯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所获得的奥斯曼帝国保证人的地位。之后,英法更是通过克里米亚战争使俄罗斯遭受重挫,并使之丧失了自拿破仑战争后在欧洲事务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6] (P.21)} 由此可以看出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客观上也在于西欧强国不容俄国强大。

一战结束之后,新生的苏俄政权并未像西欧国家那样立即获得喘息,而是面临着对外抵抗外国干涉军的武装干涉,对内肃清外国策动的少数民族独立和白卫军叛乱的艰巨任务。不仅如此,一战后的苏联由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公开敌视和排斥而未能获得真正平等的国际政治地位。直到纳粹德国最终成为整个欧洲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策源地时,西欧国家出于反法西斯的需要才开始重视并团结苏联。由此看来,“世界上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了国际社会的‘贱民’。”^{[7] (P.58)} 二战前,西方之所以迟迟未对苏联伸出结盟之手正是出于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以及根存已久的“恐俄意识”。慕尼黑阴谋的最终促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英法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能积极团结起苏联,从而未能及时对法西斯

德国的扩张行径予以有效的遏制。二战后,随着苏联已经具有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实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周边国家不断推广和建立,这使得西方对苏联的空前强大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感到极大的惊慌和恐惧。这也使西欧国家感觉到“不能靠零零星星的举措,而只能靠苏联对手睿智的长期政策予以有效的反击。”^{[7] (P.58)} 于是,西欧国家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美国,希望由它来主导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长期而坚决的遏制。而西方世界这次针对苏联的大规模遏制行动,也促使苏联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从而直接导致了冷战的爆发。

由此可以看到,西方人对俄国在历史上的崛起和强大长期抱着恐惧和歧视的态度,甚至认为俄罗斯的发展壮大必定会给欧洲乃至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庞大的帝国甚至在取得了世界规模的成就之后,它的存在本身还始终被人看作一种信念中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上的东西,俄国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8] (P.64)} 马克思对 18 世纪俄国的这段论述,被后来的事实深刻地验证了。西方对斯拉夫文明的歧视和对俄罗斯崛起的恐惧必然导致对俄罗斯的遏制。用基辛格的话说,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9] (P.124)}

二、相异的文化背景中引发的“大国使命感”促成冷战的爆发

(一) 俄罗斯基督东正教文化背景与战后斯大林“大国使命”外交观念的影响

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罗斯在基督东正教文化圈中一直处于十分显要的地位。对基督东正教文化的继承再加上俄罗斯地处东西方之间的特殊地缘政治都使得俄罗斯在近代一直以第三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同时也赋予了自己保护全世界基督教信仰的神圣使命。

15 世纪末,俄罗斯出现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认为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

三罗马”，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保护者，对信仰的忠诚将使它永远保持世界基督教中心的地位，莫斯科大公是整个世界上惟一的沙皇，一切信仰基督教东正教的王国都应合并到它的统一的王国中去。^{[10] (P.13)}

自俄罗斯东正教会在16世纪末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牧首区后，东正教文化便被俄国统治阶级奉为国粹，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并立发展。从伊凡四世起，俄罗斯又开始不断向四周进行扩张，企图建立起称霸世界的“第三罗马帝国”。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斯拉夫主义者认为，斯拉夫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负有拯救人类的使命。“救世论”对俄罗斯的政治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并成为俄罗斯人灵魂深处大俄罗斯主义的理论基础。关于大俄罗斯主义的实质是“在泛斯拉夫主义的伪装下，补充了这个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11] (P.1684)}它主要以俄罗斯民族救世主义和“第三罗马”学说为理论支柱。从彼得一世时代起，大俄罗斯主义在俄国历史演进中逐渐发展成一套注重现实利益的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19世纪初，俄国在粉碎了拿破仑的入侵后，进军欧洲，参与了推翻拿破仑帝国的军事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为协约国集团最终击溃德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再次把欧洲从德国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虽然，这些可以认为是俄国基于安全和意识形态对抗进行的地理扩张，带有防御性和正义性的色彩，却也一再折射出“救世论”的强烈意识。

二战后，斯大林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带着浓厚的“大国使命感”。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苏联付出了巨大牺牲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使它赢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和政治地位。随着苏联成为战后唯一能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超级大国，斯大林的“大国使命感”也急剧膨胀起来。他宣称，要领导苏联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废墟上重建起来，并保持世界大国的地位。^{[12] (P.468-469)}此外，他还致力于发展壮大社会主义体系，建立针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威胁的集体安全屏障。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对莫斯科选民大会发表的公开演说上宣称：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互不相容，资本主义制度是战争的根

源，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他预测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会处在另一场经济萧条的深渊中，那时新的战争将因此而爆发。他表示要再搞三个甚至更多的五年计划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使苏联具有“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13] (P.488-500)}由此可见，二战后斯大林之所以把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做假想敌而采取敌视态度，与他战后急剧膨胀起来的“大国使命感”不无关系。

(二) 基督教新教文化与杜鲁门外交中的“大国使命感”

美利坚民族承继了早期基督教新教教义中的“上帝选民”概念以及新教徒按照上帝所规定的信条改变和复兴世界的使命，坚信自己要在北美新大陆这个上帝特别恩赐的地方，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为全世界树立一个理想社会的楷模，并将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领导作用。^{[14] (P.119)}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美国领导人从建国之初起就在对外政策方面带着理想主义色彩。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威望和政治影响力空前提高，在综合实力上俨然是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国力的强盛也刺激了美国人新教色彩浓厚的“荣誉感和宗教使命感”迅速膨胀。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没有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取得过这样完整的胜利，具有像美国这样的军事力量。^{[15] (P.377)}随着苏联在战后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杜鲁门政府从综合国力的全球领先优势和自身所肩负的宗教使命感等方面考虑，针对苏联及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制定了一系列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遏制政策。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照会美国国务院，告知自己无力继续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希望美国能承担起援助的担子，以免这两个地区被苏联控制。3月12日下午，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就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杜鲁门在其国情咨文中宣称：希腊、土耳其受到的共产党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很可能危及整个中东和欧洲，甚至给全世界带来灾难；“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

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15] (P.120-121)

“除了美国之外,再没有其他国家是民主希腊可以求助的了。” [19] (P.83) 最后,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的议案。而咨文的发表标志着杜鲁门主义的诞生,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防范苏联扩张而采取的遏制政策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根植于基督东正教文化的俄罗斯文明由于受到地缘政治、交往范围和宗教传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文明形态上不单纯表现为东西方文明中的一种,而是杂糅、汇合了东西方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带有双元色彩。纵观俄罗斯文明发展的脉络,一方面俄罗斯文明的自身特性与西方文明有较大差异性,这使它在历史上虽力趋西方化却又不为西方文明所认同;另一方面俄罗斯文明中又包含着浓烈

的宗教“救世主义”,其衍生出的“大国使命感”对后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影响较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西方文明中也强调宗教“普世主义”但两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不一样。二战后,美苏两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美国受基督教新教文化中“使命观”和民主制度至上的影响,在战后外交中表现出“大国使命感”;与此相对应,苏联在战后受基督东正教中“救世论”和国力的膨胀的影响,在外交中也表现出“大国使命感”。最后杜鲁门和斯大林在各自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上,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注定要“领导世界”,“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 [3] (P.229) 这两种“大国使命感”在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碰撞不可避免地促使美苏逐步走向冷战。

[参考文献]

- [1] 高惠群.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俄罗斯的文明研究热[J]. 东欧中亚研究, 1998(2).
- [2] 季志军, 冯玉军. 一波三折俄罗斯人[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7.
- [3]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 [4] 基辛格. 大外交[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 [5] 陈乐民. 西方外交思想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6] 冯玉军, 霜木. 俄罗斯文明与西方: 文明冲突的历史考察[J]. 现代国际关系, 2000(4).
- [7] 彼得·本德尔. 盘根错节的欧洲世界[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4.
- [8] 马克思.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9] 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 [10] 资中筠. 冷眼向洋(下卷)[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 [11] 路易·莱文. 泛斯拉夫主义与欧洲政治[J]. 政治科学季刊, 1914(12).
- [12] 解力夫. 纵横捭阖——斯大林[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 [13] 斯大林. 斯大林选集(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4] 李剑鸣. 美国的奠基时代[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15] [美]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M]. 李石. 北京: 三联书店, 1974.
- [16] 刘同舜. “冷战”“遏制”和大西洋联盟[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双木)